

红色收藏



《论持久战》(左)与伪装书《文史通义》(右)

# 一本特殊的书

岳仙

山西博物院珍藏着一本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书。这本书的封面、扉页和书口都印有书名《文史通义》，印刷用纸为毛头纸，装帧朴素大方，标注为上海广益书局印行。

《文史通义》是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补遗、补遗续各一卷，共150余篇，涵盖文史理论、学术源流及方志体例等内容。这本名为《文史通义》的书，实际内容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据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这种以“文史通义”作书名的伪装书，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印制的，但也有人认为是1944年在敌占区秘密印制的。

伪装书又称“托名本”，是封面印着伪装书名以掩盖其内容的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影响下的出版机构，为对付反动当局查禁革命、进步书刊，常常将书刊进行伪装后传播，其通常做法是采取封面伪装、变化书刊名称以及伪托别的出版社名号等。这也是当时一种特殊的对敌斗争方式。

在当时，这样的伪装书为数不少。以内容划分，可分为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著作、中国共产党文件汇编、时事评论汇编、重要事件介绍等类别；在伪装形态上，有的仅伪装封面，有的则是封面及书中部分内容伪装。

《论持久战》的伪装本中，还有一种合订本，伪装书名为《大乘起信论》，是《新民主主义论》与《论持久战》的合订本。该书黄色封面、封底，在封面右上方，还有“阅毕送人，功德无量”字样；封面下端为伪托出版者“北京佛教总会印”。书的内容前37页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然后页码另排65页是《论持久战》。

伪装书中，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伪托为“播种社”出版的《论青年修养》，还有伪装书名为《论田赋法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

这些伪装书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共政策的理解方面，都发挥过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本文图片由山西博物院提供)

# 有趣的倒流壶

郭悦



豆青釉青花加紫桃形倒流壶(太原市博物馆藏)

太原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的豆青釉青花加紫桃形倒流壶十分特别。此壶整体呈扁桃形，配有弧形的执柄和斜曲的流嘴，圈足设计稳重。最特别的是，它的注入口位于圈足内侧底部，而非壶顶，使用时需将壶倒置注水，再正过来倾倒，水却不会从底部的孔洞漏出，故而得名“倒流壶”，又称“内管壶”。

倒流壶的奥秘在于其内部巧妙的结构。它运用了物理学中的“连通器液面等高”原理：壶内设有一根与底部注口相连的通心管，管的上端开口接近壶顶。注水时，将壶倒置，水从底部孔洞注入，通过内部管道进入壶身；水满后正置，由于壶嘴的根部连接在壶身较低处，且内部管道上端开口高于壶内液面，壶内的水在大气压强和连通原理的共同作用下，便能从流嘴正常倒出而不会从底部泄漏。这种无盖的设计不仅密封性好，能有效防止灰尘落入，保证壶内液体的卫生，还免去了使用时壶盖滑落的担忧，既实用又别致。

此壶的釉色和纹饰同样新颖别致。它以豆青釉为底，釉色温润淡雅，近似青桃之色。壶身以青花和紫彩点缀装饰，这些色彩共同构成了桃实、桃叶等纹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子象征着长寿与吉祥。壶顶的桃尖以红釉装饰，模拟成熟桃实的自然色泽，而贴饰的桃叶则施以蓝釉，叶片形态舒展，与红釉小桃相互映衬，既写实又寓含美好祝愿。

倒流壶的烧造工艺颇为复杂。其制作并非一气呵成，需先分别拉坯成型壶身、内部导管等各个部件，再精细地拼接黏连，最后入窑一次烧成。



苗军梅 宋爱萍

由太原市文物局、太原市纪委监委驻市文旅局纪检监察组主办，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晋祠博物馆承办的“贞珉镌德——唐代郭氏忠孝廉义文化展”正在晋祠博物馆南小亭展出。此次展览以《郭公庙碑》为核心展品，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唐代郭氏家族辉煌的历史贡献与深厚的家风文化精髓。

——编 者

晋祠博物馆藏《有唐故中大夫使持节寿州诸军事寿州刺史上柱国赠太保郭公庙碑铭并序》，又称《郭公庙碑》，系唐中兴名将郭子仪为其父亲郭敬之所立的家庙碑，唐代宗李豫隶额，颜真卿撰文并正书。原碑共18方，现存14方（缺失第2、16、17、18方），采用青石材，楷体阴刻，每方碑石纵39厘米，横48厘米，凡11行，每行8字，现存千余字。这套石碑承载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家族传奇。

## 碑刻源流 世家脉络

碑文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溯了唐代名臣郭子仪的家族源流，开篇以“夫其筑台见师，瘗子致养”两大典故，暗喻郭氏先祖尊师重道的品格，彰显孝悌传家的美德，凸显该族“家承金穴之贵，政有露冕之高”的士族精神文化基因。继而以“为太原著姓……或恕或谋，或肃或义，皆海有珠而鸟有凤也，阅阅之盛，其流益光。”将郭氏历代贤才比作沧海明珠、百鸟金凤，追溯郭氏千年望族渊源，亦点明“义”为家族立身之本。隋代郭履球任京州司仓时，“懋其德辉，不屑下位，克己复礼，州邦化焉”，以德行感化百姓，正是以“义”化民的典范。凉州司法郭昶则“能世其业，以伸其道”，让家族的道德传承与治世之道代代延续，构筑起“忠义相济”的家风根基。

第二部分详述了郭敬之历任官职、官爵及生平功业，褒扬其清廉施政与教化治民的德政，塑造了文武兼备的士族典范形象，强调“以仲由之政事，兼翁归之文武”“文经武纬”的家风家训，最终培育出兼具政治洞见、战略眼光与处世智慧的郭子仪。

第三部分盛赞了郭子仪的军事才能、赫赫战功、高贵品格，将其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再造唐室的丰功伟绩，归因于“太保府君之善训”，强调家族教育对个人品格塑造的深远影响。即便位极人臣，郭子仪始终恪守臣节，深得皇帝信任。“勋庸举集，今古莫俦”“岂比夫神明积高之壤”“炳灵毓粹，奕叶生贤……其唯郭宗乎”等赞颂之词，道出了太

原郭氏“括宇宙而禀和，总河山而蕴秀”的兴盛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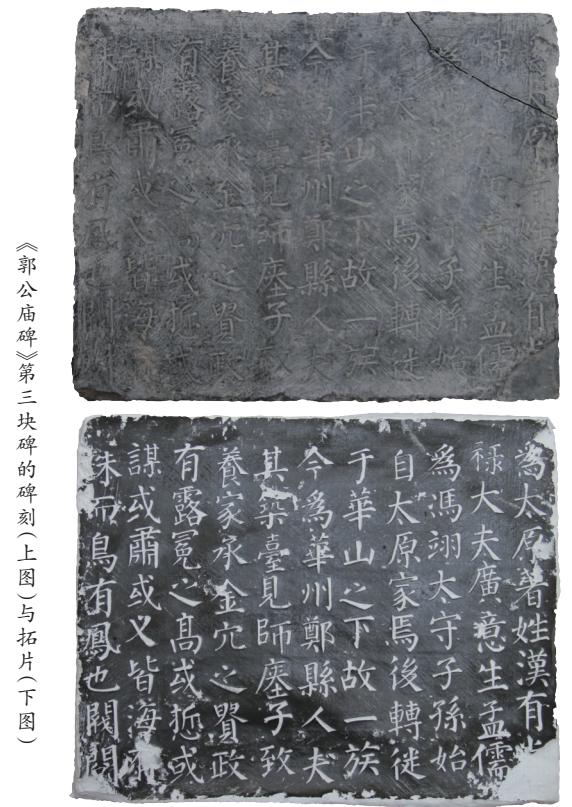
最后一部分叙述了代宗賜庙、追赠的荣耀时刻，“宠治哀荣”的记载，使“所以仁祖考，鸿伐之刻，亦以垂子孙”升华为政治治理符号，彰显了朝廷对郭氏家族的特殊礼遇，强调因功受封的显赫官职使家族政治地位更加巩固。“源长流光，施于司仓。凉州兵部，克炽而昌，载德深兮”的家族史诗刻入青石，一座家庙已成华夏精神图腾，生动展现了中唐时期“家国同构”的价值观，深刻反映了唐代“忠孝一体”的理念，让后人得以透过冰冷的石碑，触摸到千年前炽热的历史脉搏。

## 清节立世 忠孝传家

《郭公庙碑》作为士族文化的珍贵载体，以“忠孝传家”为核心，以精炼的碑文语言立体展现了儒家伦理在家族实践中的完整图景。碑文通过“言必主于忠信，行不违于直方”的表述，确立了家族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其中“忠”体现为“推赤诚而许国，冒白刃以率先”的报国精神与忠义之道，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孝”体现为“天然孝悌”的家风传承、“糜子致养”的孝行实践，“孝思孔昭，亶居敬焉”的情感表达，以及“忠于国而孝于家，威可畏而仪可像”的双重伦理坚守，将《孝经》中“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的理念具象化。这种“盛德累物，宽身厚下”的处世哲学，构建了完整的儒家道德体系，成为郭氏家族安身立命的根基。

碑文强调“清白为吏者之师”的廉政传统，侍牛中仙因赞赏郭氏的“清节”风范，奏授其绥州之职。而故中大夫寿州刺史郭敬之，更是“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的典范。他“用情不间于疏远，泛爱莫遗于贱贫。拳服跟膺，终始靡二”，以平等仁爱之心待人，无论亲疏贵贱皆以诚相待，堪称唐代士族“义德双馨”的典范。这种仁德情怀与“所莅以清白见称，居常以经济自命”的记载相呼应，凸显出士族将廉洁奉公与经世济民视为维系门第的关键。这种“端一之操，不以夷险聚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的品格坚守，达至“所居则化，所去见思，人到今称之，斯不朽矣”的治理境界，既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躬身实践，也是士族维系门第声誉的重要方式，完美契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式。

在教育理念上，碑文以“骑射绝伦”的武略与“式如金兮”的坚韧品格，彰显郭氏家族“文武兼修”的育人之道，既要求子弟具备“秉冲邈之高烈”的武将气魄，又推崇刚正不阿的处世准则。这一理念培育出“友于著睦，曾龙虎者十人；贻厥有光，纤青紫者八士”的情义齐家、精英群体，使其



“源长流光”的家族根基成为唐代“出将入相”政治生态的典型。

《郭公庙碑》的文化价值，更体现在其构建的“家国同构”范式中。碑文中“死生敦交友之分”的义利观，与“仁人之所及远哉，孝子之事亲终矣”的慨叹相呼应，将个人德行、家族伦理与政治使命熔铸为“义贯家国”的精神内核。这种以“端一之操”坚守品格、以“德盛必百代祀”践行责任的价值体系，通过“神之听之，永锡难老”的碑刻得以升华。终篇“乃立高碑，盛美奚祭，日月有既，徽猷永垂”的结语，以“垂于后昆”的追求，使“清节立世、忠孝传家”的精神超越时空界限，将个体德行、家族兴衰与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镌刻为文化记忆，成为古代廉政文化的鲜活标本与当代“家国同构”理念的价值参照，其蕴含的精神力量至今仍熠熠生辉。

(本文图片由姚远提供)

# 穿“钹”千年

钩 希



左图：亚醜钹(山东博物馆藏)  
右图：兽面纹青玉钹(山西博物院藏)

在山东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的展柜中，分别有一件“钹”，虽相隔千里，却共同诉说着中华文明跨越3000年的传承。一件是山东博物馆的青铜亚醜钹，是商代的礼器；另一件是山西博物院的兽面纹青玉钹，是民国时期的仿古雅玩。

亚醜钹是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65年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遗址。它高32.5厘米，刃宽34.5厘米

米，重4.6千克，钹身透雕人面纹。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它那张独特的“人面”——双目圆睁，嘴角上扬，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仿佛带着神秘微笑。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有“亚醜”二字，考古学家为其取名“亚醜钹”。这些特征让现代观众觉得它“丑萌”，但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却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

山西博物院的兽面纹青玉钹，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仿古玉器。它选用青玉为材，采用“减地”浅浮雕技法，雕琢出精细的兽面纹与卷云纹，风格精致典雅。与青铜亚醜钹的狞厉威严相比，青玉钹更显文人趣味与仿古意蕴。它承载着当时人们对商周青铜文化的追慕与再创造。

两件钹虽相隔3000年，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亚醜钹的人面兽相纹饰被认为是商代流行的饕餮纹演变而来，而青玉钹上的兽面纹同样延续着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传统。它们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对“钹”这一古老器物的理解。一件是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实物见证；一件是20世纪初文化复兴与仿古风尚的体现。

将亚醜钹与兽面纹青玉钹相连的，不仅是器物之形，更是文明的传承与延续。文化传承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当下的理解与创造。当我们把这两件钹“放在一起”，仿佛能看到一条文明之河从远古流淌至今，依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白玉嵌宝石描金碗(山西博物院藏)

在山西博物院琳琅满目的馆藏中，有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白玉嵌宝石描金碗，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吸引着无数参观者的目光。这件高6.9厘米、口径12.2厘米的玉碗，是清乾隆时期琢玉工艺的杰出代表。

该碗以优质和田白玉雕琢而成，材质温润莹白，器壁薄透，加工精巧。碗腹外壁以各色碎宝石堆贴成花叶相拥的宝相花图案，内壁浅浮雕石榴纹，口沿及足部饰描金纹样，整体纹饰繁缛华贵。玉碗的制作融合了玉石雕刻、宝石镶嵌与金属描绘三种技法。

乾隆时期，新疆和田玉经长期开采与运输，大量进入宫廷，成为皇家玉器制作的首选材质。和田白玉质地温润细腻，色泽纯净柔和。其莹润的光泽，在光线映照下，流转出含蓄而典雅的气韵，为整件器物奠定了高贵、素净的基础。

该碗敞口、弧腹、圈足，线条流畅自然，比例精妙和谐。敞口设计便于使用，又在视觉上营造出开阔之感；弧腹弧度优美，贴合人手握持，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圈足稳固器物，使碗放置平稳，细节处彰显工匠对实用与美学平衡的把握，体现出当时玉器造型既传承经典，又贴合生活需求的特点。

这件玉碗并非传统中式玉器，而是有着浓郁的“痕都斯坦”风格。痕都斯坦是清代对北印度莫卧儿帝国及中亚地区的统称，该地区制作的伊斯兰风格玉器在清乾隆时期传入我国。这类器物以金银丝、宝石镶嵌为特色，纹饰密集却层次分明，题材多以蔬果花卉为主。白玉嵌宝石描金碗正是这种仿制风潮下的杰作，体现了清代玉器工艺与异域装饰风格的完美融合。乾隆对此类玉器十分推崇，不仅大量收藏，还命宫廷匠人加以仿制。

白玉嵌宝石描金碗，以温润白玉为骨，以璀璨宝石为饰，以华丽描金为彩，集材质美、造型美、装饰美、工艺美于一身，不仅是一件实用与艺术兼具的器物，更是当时工艺水平、文化内涵与帝王审美融合的产物。

# 录事司官铜镜

艾 荣



“录事司官”刻铭

前些年，在汾阳的一座金代墓中出土了一枚特殊的铜镜。其镜背纹饰典雅，内区为桥钮与尖角方花纽座，环绕四片带柄荷叶，外区饰勾连云纹。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并非纹饰，而是其外缘清晰雕刻的“录事司”四字及一枚画押。

这行刻铭并非随铜镜一同铸造，是铸成后官府所加。所刻内容也非常常见的祈福吉语，而是一种官署印记。这是因为金代严厉的“禁铜”所致。铜作为铸造钱币的原料，关乎国家命脉。金代战争频繁，铜资源紧缺，朝廷为保障货币流通，屡禁令：严禁铜器越境、私铸铜镜，并强制民间旧铜器上交官府折价。

在此背景下，官府对铜镜的生产流通实行严格管控。铸镜需官方审查，成品须经地方官吏检验，加刻官署名称及画押，方获准上市。违者将受刑罚。因此，“录事司”印记，正是这枚铜镜经官方检验、合法流通的凭证。



录事司官铜镜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白玉嵌宝石描金碗

邢占平